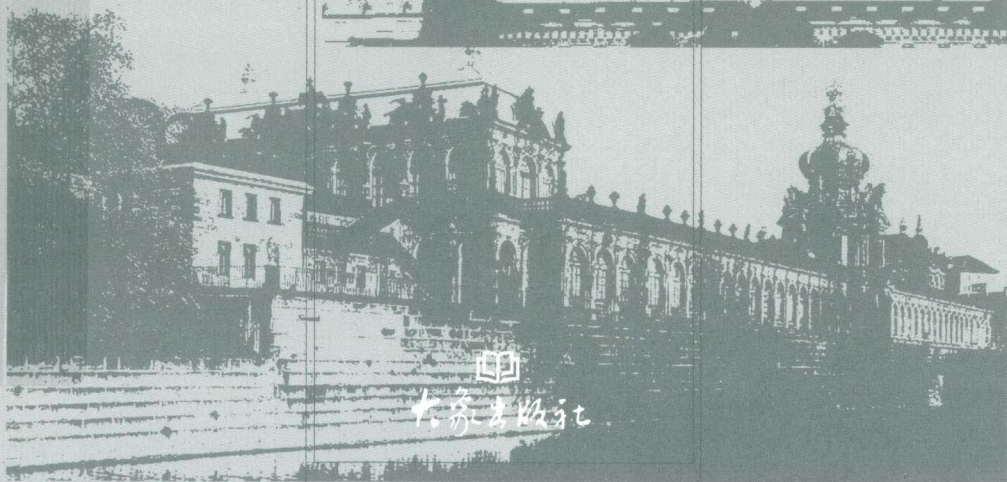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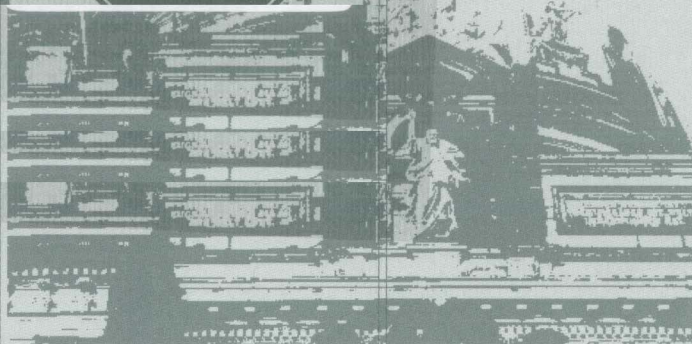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莱布尼茨 思想中的 中国元素

张西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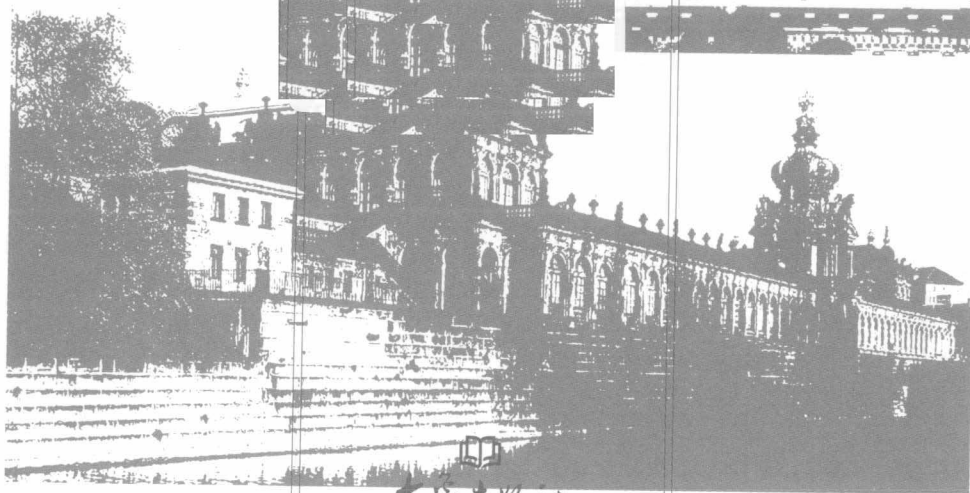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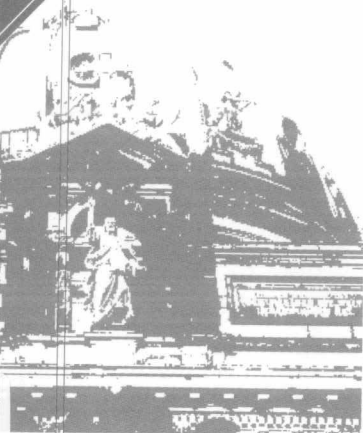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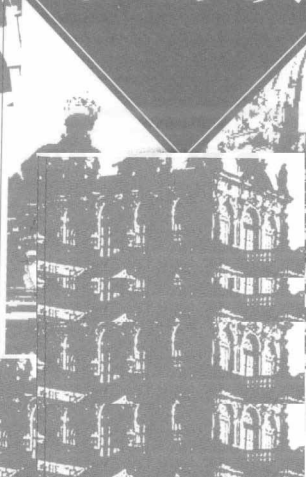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社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张西平 主编

莱布尼茨 思想中的 中国元素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张西平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347 - 5854 - 6

I. 莱… II. 张… III. 莱布尼茨, G. W. (1646 ~ 1716) — 哲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516.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3152 号

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李建平 石更新

封面设计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41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序言一

莱布尼茨是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 20 年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莱布尼茨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中国热”的时代，“当莱布尼茨慢慢地进入当时的精神世界时，中国已成为欧洲的日常话题”。^① 莱布尼茨显然不是那种因喜欢中国庭院和漆木家具而爱上中国的人，他是一个欧洲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精神倾向有着自己更为深刻的原因。这点通过他的《中国近事》最典型地表现出来。

一、《中国近事》的出版

1697 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事》是莱布尼茨第一部，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在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中国近事》以前，他已经长时间保持着对中国的兴趣，1666 年他在自己的《论组合术》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的文字。1689 年 7 月和 8 月间他在罗马结识了在华的耶稣会士闵明我，这恐怕是他的意大利之行的最重要收

^① 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dia Leibnitiana, Supplementa 25, Wiesbaden 1985.

获,因为从此他和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有了直接的联系。莱布尼茨可以直接从耶稣会方面得到关于中国的消息。

实际上,出版《中国近事》的想法恐怕在莱布尼茨的脑中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因为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史》一书的摘要是他在1689年访问罗马时就写下的,1695年他收到了从罗马见面后返回中国的闵明我的回信,同时,在这一年他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教父那里见到了在华耶稣会士张诚所写的有关《尼布楚条约》的信件和《1693—1695年俄国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这份文件。1697年他又收到了德国的耶稣会士约翰·克雷夫(Johannes Clerff)的两份重要文献,一份是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年)^②写的信,一份是当时耶稣会在北京的负责人苏霖神父的信。苏霖神父的这封信最长,也最重要,它实际上相当于明末到康熙初年的中国天主教史,这封信使莱布尼茨知道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可以想象得到莱布尼茨收到这两封信时的兴奋心情,在收到这两封信以后不到一个月,《中国近事》就出版了,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中国近事》第一版所报道的中国情况,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没有过的。这六篇文章各具特色,内容十分丰富。六篇文章中五篇是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写的,一篇是外交官员写的。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两篇反映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的文章中,苏霖神父和安多神父的信是两篇难得的好材料。他们都长期生活在北京,了解康熙皇帝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新进展。信中介绍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史》摘录,讲述了传教士在和杨光先的斗争获得胜利后,南怀仁主持钦天监所开展的科学活动,这份文件不长,但内容很具体,使读者能感受到传教士在北京的科学活动。南怀仁在报告

^② 安多为比利时在华的传教士,到澳门后被南怀仁召到北京,1709年死于北京。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03—412页,中华书局,1995。

中写道：“皇帝要求南怀仁神父负责并制造六个不同种类的欧洲式的天文仪器。四年期间，他花费了大约 19000 欧洲古币（Imperialium）。同样受命于皇帝，南怀仁神父还制造了 55 个不同的机械仪器，其中一部分为他自己使用。他还用滑轮的方式搬运一些修筑皇陵用的巨石通过了很长的桥，代替了原本需要用 500 匹马才能完成的工作。南怀仁神父采用一个 8 里长的引水管开发出泉水来。他还引用新的机械技术，铸造了 132 个铜制战炮，同时自己制造新战车。他受命于皇帝，解释了机械工程基本原理。他还填补了星球的天文表，以及计算了两千多年之后的日食。他正在以天文学家的名义来研究和引述，把辩证法和哲学传给中国人。他这样做，事实上，是为了使天主教的真理显现得更明确。在天文仪器中，我们可以找到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等。朝廷官员小心翼翼地记录着针对时间怎么样分配的天空现象。他们每天还给钦天监主管汇报结果。事实上，他们每天观察到了中午太阳的影子，记录在圭表上。至于铜制天体仪，虽然它重达 2000 斤，但连一个小孩也能使它旋转，并且它可以提升到任何一个经纬度。”这些内容具体，描写生动的文字，使每一位读者都印象深刻。

张诚的《关于〈尼布楚条约〉的报告》报告了中国和俄罗斯签署《尼布楚条约》的情况，这是中国 17 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反映了康熙较为进步的外交思想。报告虽然不长，但扼要地介绍了谈判的情况。张诚在报告中写道：“张诚神父与葡萄牙人徐日升神父，被中国皇帝派遣到东部鞑靼两次，目的是当中国代表团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官。俄国帝国逐渐扩展到西伯利亚广大的地区，最后他们终于碰到了中国人与鞑靼人。在建筑完一个城堡之后，俄国人开始声称享有打猎和获得兽皮的权利。从此以后，几乎有三十年十分艰苦和残酷的战争。城墙被中国人摧毁了两次，但俄国人都修复了。第三次城墙被包围的时候，俄国人几乎投降了……于 1688 年，中国知道俄国特使团已经来到了边境，即在东北的色楞格

城,靠近北京四百里处。为了和平,中国部队撤退了。就在那个地方,俄国特使团等候中国使团。北京朝廷决定派遣一个最具有权威的使团前往。本使团一级将领及礼宾司陪同,他们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使团中还有一位大臣,他曾经阻止杨光先对教会的迫害,并借天主的恩宠,使教堂重新开门了。另外一个拥有鞑靼民族身份的汉人,是一位皇帝的伯叔。这个使团是由多位高级皇宫官僚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由8000到9000人组成的,其中包括3000名士兵、150位文官,再加上12000匹马、3000匹骆驼和50门大炮。俄国代表团,虽然数量上少一点,但是在耀武扬威上双方势均力敌。经过多次幕后交涉,终于在1689年9月3日,在尼布楚城俄国人建立的教堂里,双方签订和平条约。”^③这是欧洲国家和中国所签的第一份外交条约,莱布尼茨在这里报道给欧洲人是很有意义的。

布兰特的《1693—1695年俄国使团访问中国的沿途见闻》在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出版以前,在欧洲已经被出版过,它从地理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华传教士闵明我于从欧洲返回中国时试图走这条路,但没有成功。莱布尼茨一直想通过俄罗斯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为此花费了很多心思,他把这封信重新在《中国近事》中发表,表示了莱布尼茨的这个想法。闵明我的信很短,但这是六封信中唯一一封直接和莱布尼茨有关系的信。

从内政到外交,从科学活动到地理交通,从官中的基督教发展到中国政府在对待基督教问题政策的确立,这六封信全方位地介绍了当时的中国,使欧洲的读者对清朝的政治、科学、宗教、文化、外交、历史、地理等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直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近事》的第一版中,《欧洲天文学史》一书的摘要中有一些南怀仁对康熙的描写。南怀仁写到“约四年之前,皇帝每天召见

③ 《中国近事》,第48—49页,大象出版社,2005。

他,持续五个月。皇帝几乎每天从早到晚让南怀仁神父讲解耶稣会士所写的约 120 本有关天文学的书。那时,他和一两个人与皇帝在一起。南怀仁神父常在内宫里午餐,使用的是镀金餐具。皇帝给他很多荣耀,外国大使们都感觉到皇帝对他的特殊礼遇,而他们必须在很远的地方才能觐见皇帝”。“皇帝还要跟南怀仁神父学习,请他解释清楚有关利玛窦翻译的《欧几里得原理》一书,这本书是天文学的基础。经过一段艰辛的研究,康熙完整地了解了所有的相关问题,他还下令把这本书翻译成满文。后来,康熙也学习了算术,以及平面和立体三角分析。通过艰难的数学问题之后,他才很轻松地学会使用几何、地面测量学和地形学。康熙在算术方面很成功,还自己训练不同的定比规律,甚至会开最困难的平方与立方。他曾经尝试过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当他会用线把他自己预算的地形学的结果实证时,他感觉到十分满意。皇帝还以纸做成的环来显示星球理论。同样,他也花费几夜的时间把固定星球的系统铭记在心,使他仰望天空时,很容易就能说出星球的名字。过去星球曾经引导东方三王朝拜上主,如今让中国皇帝接触到欧洲的天文学精华,希望这种对星球的认识也能成功地引导远东的人们去朝拜和信仰真正的星球主人。”^④

白晋回欧洲后看到了《中国近事》,他对莱布尼茨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但他觉得书中对康熙皇帝的介绍仍不够详尽,于是他给莱布尼茨写信说:“您热心地了解并宣传在中国传播福音取得的进展,希望在中国皇帝的支持下让整个帝国归化基督教,为答谢您这一片好意,请接受一本我不久前刚出版的有关中国那位伟大君主的小书,我想这本书您应该会喜欢。”^⑤

莱布尼茨收到白晋的信后十分高兴,他很快在 1697 年 12 月 2 (或 12) 日回复了白晋,对白晋的支持和热情他表示感谢,同时建议

④ 《中国近事》,第 38—39 页。

⑤ Herausgegeben von Rita Widmaier, *Leibniz Korrespondiert mit China*, p6, Frankfurt am main 1990, 此书以下简称 LK。

将白晋的《康熙皇帝传》翻译成拉丁文在《中国近事》中重新出版,他说:“您说要寄给我您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皇帝的作品,能在我的书里增加这样一段中国皇帝的小传,真是太完美了。我也十分期待您关于中国皇帝颁布容教令并允许自由传教前因后果的新作。我对您给予我的恩惠深表感谢,唯愿自己不致辱没您对我的好意。希望您的大作不仅用法语,也用拉丁语出版,让更多的民众都能拜读、受益。”^⑥

白晋的《康熙皇帝传》在整个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是一本十分特别的著作,是唯一一本专门向欧洲介绍康熙皇帝的书。

在白晋的笔下,康熙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他具有与生俱来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禀赋:思想活跃、明察秋毫、博闻强记、智力过人。他有处理一切要务的刚劲毅力,有规划、指挥、实现宏伟事业的坚强意志。他的所有禀性嗜好均高雅不俗,符合其帝王身份。”“康熙皇帝自即位之时起,就专心致力于文武两道,尽量使自己统治下的鞑靼人和汉人都对自己怀有好感。”他力量过人,能拉开朝中无人可以拉开的弓;他马术娴熟,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武艺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对西洋火器的使用如同使用弓箭一样;他喜欢音乐,无论是中国的、满人的,还是西洋的,他都能演奏;他热爱科学,为学习西方的科学,不耻下问,向传教士们请教;康熙熟读儒家的经典,许多经典烂熟于心。按白晋的说法,他几乎读过所有汉文典籍,而且通晓汉诗。他生活简朴,从不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他不仅仅是一个君子,同时也是有着很高统治术的帝王。他威严谨慎,善于倾听部属和各方面的意见。白晋认为,康熙皇帝具有极敏锐的观察力,人们很难对他隐瞒事情的真相。“同时,由于他天赋极高,判断力极强,所以能够从一切复杂的事务中,找到最合理的解决办法。”他爱民、仁慈,善于选拔有才能的官吏,同时对各级官吏严加管理。白晋说:“由于康熙皇帝重视人才,所以经常提拔那些吏部推荐之外的人担

⑥ 参阅 LK,第 68 页。

任要职。当他发现优秀的人才时,立即予以破格提拔,委以最高最重要的职务,并公开赐予他特殊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如果一个官吏被控收受金钱,康熙皇帝就会毫不宽容地予以制裁,对任何人都绝不留情。”

在三藩叛乱期间,他临危不惧,以聪明才智和怀柔政策很快瓦解了叛军,不仅平定了南方的叛乱,也镇压了北方的叛乱。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康熙皇帝都得心应手,在他的管理下,清帝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因为这本小书是白晋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所以他说“对在地球的极远之地发现了一位当时在法国之外从来未曾见到过的君王而感到惊讶。他和陛下一样,智慧精深非凡,兼具帝王胸怀,严于修身治民,备受国内外民众的爱戴。简言之,这位皇帝集英雄美德于一身,即便他的治国之道尚远不如陛下,但至少也可以被称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白晋是利玛窦路线的极好的解释者,在他的笔下,虽然中国人不信仰天主教,但他们开化到了极高的程度,“因而一直走在其他异教国家的前面。所以,如有品行端正,业绩卓著,能够博得他们尊敬与信赖的人,能够采用正确方法向他们明白通顺地宣传福音真理的话,他们远比其他国民更易接受甚至信奉这些真理……”这样既肯定了耶稣会在华的传教路线,也使欧洲的读者更加积极地支持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

同时,在白晋对康熙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整个欧洲思想的熟悉和了解,当时的欧洲正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像康熙这样英明的君主、伟大的帝王的形象不仅会得到像法王路易十四这样野心勃勃的帝王的喜欢,就是对正在走向世俗社会的一般民众和读者来说也是相当能打动人的。所以,白晋这本书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第二版时将其收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莱布尼茨在对华认识上和白晋的契合,这是他们两人合作的一个开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二、《中国近事》的思想文化意义

《中国近事》是当时的欧洲思想和文化界主流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系统介绍,因在此之前对中国的介绍主要停留在教会的范围内。莱布尼茨作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名流、学术巨人,他在《中国近事》中表达了欧洲思想和文化界的一种新的倾向和新的文化态度。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对欧洲应对中国和东方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态度的论述,对中西文化交流所抱有的热情及宽阔的文化视野是莱布尼茨整个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 and 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他的这些思想和观点无论是在 17 世纪还是在今天都卓而不群,他的这一部分思想不仅是欧洲 17 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整个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莱布尼茨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交流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他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 Tschina^⑦。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⑧

也正因此,莱布尼茨对在欧洲与中国之间从事文化交流的耶稣会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 1695 年 5 月给维利乌斯的信中说,入华传教士在中国所从事的是“牵涉到良知、荣誉和实用的最伟大的事业”。他希望欧洲能付出更多努力推动这项在中国进行的伟大事业,耶稣会神父们已经为这项伟大的事业播下了种子,获得了如此丰

⑦ 即中国,这是当时的读音。

⑧ 《中国近事》,第 1 页。

硕的成果,从而欧洲对这项伟大的事业充满希望。^⑨ 在莱布尼茨看来,由传教士所承担的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所以被认为是“伟大的事业”,它由两个基本点构成。

其一,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可以使双方学习到对方的历史经验,从而促进各自的发展。他在1697年给白晋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说:“您如果能告诉我一些有关从中国带来或是已经或将要运往中国的东西的具体情况,那就太好了。我对这些很感兴趣,因为我非常希望这样的交流能顺利进行,我认为这在当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我们欧洲,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如果有机会,我会很高兴地为之作贡献。因为我们能够几乎像注射一样把我们的知识技能一瞬间传授给他们,我们也一样能从他们那里一下子认识一个崭新的世界。若不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不知道要用多少世纪才能掌握这些知识。”^⑩这里,莱布尼茨说得很形象,由于有了这种文化的交流,双方学习对方的知识几乎像“注射一样”,在“一瞬间”就把自己所不知的知识学习到了手。莱布尼茨所设想的毕竟有些浪漫,但却揭示了文化交流的一个真理。实际上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通过传教士这个中介,在1500—1800年间,欧洲与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使双方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二,在交流中创新,在交流中发展。在莱布尼茨看来,欧洲与中国的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仅在于学习对方的历史性的知识与文明的成果,而且可以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火花,从而推动两大文明的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相遇和交流意义重大,它会孕育千万美好成果,千万发明创造”。^⑪ 历史虽然没有像莱布尼茨设想的那样美好,但历史的实际进程也同样证明了他的

⑨ 参阅 LK,第30页。

⑩ 参阅 LK,第64页。

⑪ 参阅 LK,第61页。

这一想法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莱布尼茨对当时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把这种交流称为“文明之光的交换”,“我觉得它是如今最伟大的事业,不仅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福音的传播,更有利于人类的幸福,有利于我们欧洲与中国各自科学与技艺的成长,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换,能在短时间内让我们掌握他们奋斗几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让他们学会我们的技艺,丰富双方的文化宝库。这都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光辉伟业”。^⑫

第二,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是一种完全平等的交流。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光辉伟业”所以需要,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差别的基础上的,有了不同才会有交流的愿望,有了不同,才会产生在异中求同的想法。对于这一点,他有很多精彩的分析。

他认为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点,即他认为欧洲的长处是思辨与数学,这方面中国无法和欧洲相媲美;反之,中国的长处是实践性和经验性,而这点正是欧洲所缺乏的。数学计算要推理,这样欧洲在逻辑方面要强于中国。但是中国历史悠久,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区域,这种文明从未中断过。欧洲则不同,由于民族的迁移等多种原因,其古代的许多文明成果并未保留下来。所以,这两大文明应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就是他在《中国近事》中所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一文明古国在人口数量上早已超过了欧洲,在很多方面,他们与欧洲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各有所长。但是,我首先应该在二者之间比较什么呢?在各方面进行比较虽是有利的,但这是一项长期的考察,这里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实用艺术和自然实验的能力上,我们和他们不相上下,双方都具有借助与别人交流而受益的知识。在知识的深邃和理论思考的方法上,我们则明显更胜一筹。因为除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对精神事物的认识方面——即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明显占有优势的学科——

^⑫ 参阅LK,第55页。

以外,我们在对由理智从具体事物抽象出来的观念的理解方面(比如数学)也远远超过他们。因此,中国的天文学也低于我们的天文学。由此中国人被认为对伟大的理性之光和论证的艺术所知甚少,而只满足于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熟悉的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几何学。在战争科学方面,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平,然而这并非出于无知。因为他们蔑视人类中一切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他们更是厌恶战争本身——这几乎是在仿效基督的崇高教义。如果只有他们自己在地球上生存的话,这确实是明智的态度。然而,我们今日的世界却不是这样,就连那些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也必须学习‘战争的艺术’,否则便不会获得统治一切的力量。在这些方面,我们超过他们。”^⑬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在社会伦理方面欧洲与中国也有不同。他说:“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还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是远胜于我们的。”^⑭

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莱布尼茨始终是一种平等的态度,他没有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文化至高无上的观点,他在《中国近事》中说:“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教授我们感兴趣的東西——实用哲学之道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其他艺术……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⑮1692年3月21日他在给闵明我的信中说:“我们请求您以您的智慧来考虑,是天使赋予您此次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使命。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应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其他民族无权强迫中国人接受

⑬⑭ 《中国近事》,第1—2页。

⑮ 《中国近事》,第6页。

什么,恰恰相反,是友善和君主委托赋予您的威信。”^⑩1705年8月17日,他在给巴黎负责整个东方传教的维利乌斯神父的信中说:“既然是您管理外方传教事务,而且您曾很好心地帮助我与您的传教士们通信,让我能不时从中获益,我希望欧洲能从这次在中国探索发现的机会中获得更多利益。因为我担心等中国人学会了我们的科学,他们总有一天会将欧洲人驱逐出境。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抓住这些机会用我们的知识与他们作交换补偿自己。因为虽然我发现大部分我们的传教士倾向于用鄙视的口气谈论中国人的知识,但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方式、手工制造技术,甚至是游戏与我们的几乎全部大不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哪怕是一份对他们日常事务毫无文采但准确无误的描述,也一定会让我们备受启发,这在我看来比了解不少学者热衷的古希腊罗马人宗教仪式和用具有用得更多。”^⑪

从这个基点出发,他对中国的一切简直着了迷,这里既表示出了他那宽阔的文化视野、平等的文化态度,也反映了一个科学家的好奇、认真。

《中国近事》出版以后,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影响,给莱布尼茨带来不少声誉。^⑫同时,也使他深深地卷入了有关的中国事务当中,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应在他的门前挂一个“中国事务办公室”的牌子。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当代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就《中国近事》所展开的一次研究,这次会议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波茨坦莱布尼茨文集编辑部联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在这里感谢我的同行德国波茨坦莱布尼茨文集编辑部的主任鲁道夫先生和国际著名的莱布尼茨研究专家、柏林工业大学的教授李文潮先生与我们海外汉

^⑩ 安文铸等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第13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⑪ 参阅LK,第213页。

^⑫ 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72—292页,科学出版社,2002。

学研究中心的精诚合作,感谢我们汉学中心的几位同仁。我们希望这只是我们合作的开始,由此而开创了一个中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共同研究莱布尼茨的新局面。

张西平

丁亥年正月十五于北京

序言二

“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这是1697年《中国近事》发表时莱布尼茨自己撰写的副标题。以这本著作中文版的出版为契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文集编辑部共同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收集了这次会议的部分论文。随着这本集子的问世,会议上宣读的报告进入了与学术研究界的交流与切磋之中。

如上所说,300多年前莱布尼茨亲自收集材料撰写前言发表《中国近事》的目的,是为了呼吁他那个时代的政界与学界关注中国,让他们认识到,假如对中国特别是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视而不见,欧洲人便无法理解自己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历史机遇;假如中国与欧洲不能携起手来共同努力,那么总体来看人类的幸福与进步便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应该承认,与莱布尼茨的宏伟设想相比,我们通过这次会议所做的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毕竟为实现莱布尼茨的设想作出了自己的一点微薄的贡献:在这本集子中,中国学者们见到的不仅仅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同行,还有来自美国、以色列和日本的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文集令人信服地体现了莱布尼茨这位伟大的百科学者在